

湖北农民工复工之难亟待破解

□□ 柯利刚



全国新冠肺炎新增病例降至个位数了,其他地方的农民工都陆续开始返岗复工了,而湖北的农民工基本上都还“窝”在家里。

返岗复工,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十分重要和急迫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无法开展“线上办公”,干一天活、挣一天钱,工作暂停就无钱可挣。疫情强制按下“暂停键”之后,对于都市上班族而言,可能是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对于农民工来说,则有可能是生存生计面临困境。

农民工受疫情影响大于其他人员,湖北农民工受到的影响又大于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在疫情防控初期,“恐鄂”心理曾四散蔓延;在复工复产阶段,“拒鄂”做法又并非个例。据媒体报道,一些疫情期间不曾回过湖北的湖北籍人员,正面临着社区不让回、企业不敢用的窘境。有些人即使提供了居住证明、健康证明、复工证明、手机漫游记录等个人记录,也无法顺利返程复工。如此情形如果任由发展,当湖北的疫情已经不再告急,一些湖北农民工的生计怕是又要告急了。

各地严防疫情输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严防的对象是新冠病毒,而不是湖北同胞。经湖北省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评估,截至3月15日24时,湖北省低风险市县增至71个,中风险市县降至4个,高风险市县有1个(武汉市城区)。也就是说,湖北省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属于低风险地

各地严防疫情输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严防的对象是新冠病毒,而不是湖北同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早就有强调,要“帮助低风险地区的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一些地方和企业的“拒鄂”做法,特别是对待湖北低风险市县农民工的一刀切做法,不符合分区分级防控要求,属于典型的过度防控。

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早就有强调,要“帮助低风险地区的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一些地方和企业的“拒鄂”做法,特别是对待湖北低风险市县农民工的一刀切做法,不符合分区分级防控要求,属于典型的过度防控。

当下湖北农民工复工之难,除了难在“拒鄂”的错误做法,还难在复杂的程序设计、低效的信息沟通和阻断的省际交通。一些劳动力流入地对于农民工返岗有一系列的复工手续,如要求填写目的地接收证明、单位用工证明、健康证明、承诺书、在家情况调查表、手机14天行程查询短信截图等。对于湖北农民工而言,且不说这些手续办不办得下来,办理过程对于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农民工,就存在相当的困难。

此外,信息沟通也存在明显不足,拿健康码认证而言,湖北的健康码,其他地区不一定认同。健康码这一新技术,本来是用作破解流通难题的,但你认你的健康码,我认我的健康码,彼此之间如果不能实现互通互认,那新技术不但破解

不了难题,还会造成“数据孤岛”,形成新的阻碍。

当前,湖北省之外,其他省份的省际交通基本恢复。公共交通没有恢复,湖北农民工想要返岗复工,要么自己开车返岗,要么接受“点对点”服务返岗。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私家车,“点对点”服务的数量和运力又极为有限,受限于这些因素,一些湖北农民工即使办好了各种手续,也难以离开家门。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962元,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防疫需要,湖北农民工已经作出了一定的牺牲,劳动力输入地区在复工复产的时候,对待湖北农民工,不求优先用工,但求平等对待,千万不要因为毫无道理、毫无必要的“拒鄂”做法而让他们遭受“次生灾害”。浙江省温州市为湖北籍员工专设了2亿元的企业留岗留薪补助,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此举必须点赞,也值得借鉴,“湖北加油”,除了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种行动。

此外,也有必要简化流通手续审批,

推行多元化的认证体系。江苏交通防控组确立“有码认码、无码认单”的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了很好的示范。过于繁杂的审批表单,该废除的废除,该清减的清减,该合并的合并;各地健康码,有必要实行跨省、跨区域互通互认。湖北各中低风险地区,在逐步开通地区内交通之外,也有必要根据客观情况研究及时、适时开通省际交通。

据调查,湖北省农民工突破1000万人,其中省内务工的达500多万。因此,推动湖北农民工复工返岗,除了要打通“往外送”的渠道,也要创新“内部用”的模式。湖北已经实施分区分级的防疫策略,但湖北的疫情毕竟不同于其他地区,各行各业完全复工复产,也会慢于其他地区。这就意味着,一些在湖北省内就业的农民工,还需要继续等待些时日,才能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湖北各地区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新内部招工用工模式,或动员投身农业解决一批,或鼓励重大项目吸纳一批,或扶持创业带动一批,或开发公益岗位安置一批,就执行时间而言,这些模式落地能提前一日就提前一日;就服务对象而言,这些帮扶政策能多帮一人就多帮一人。

湖北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湖北农民工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人群之一。过去的这个冬天,他们已经遭受了一段又长又冷的煎熬;春天已经到了,希望他们的生产生活能够早日“解冻”。



绘图：朱慧卿

据媒体近日报道,一些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企业反映,当地政府部门仍在给企业复工复产设置不切实际、过于苛刻的要求。比如,一些没有报告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地方却要求建筑工地在复工前除准备好口罩消毒液外,还要准备防护服;有的地方复工复产审批表格不停更换,报上去的表格被多次打回重填。地方政府一方面下文件要求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层层设限,这让企业左右为难。

这正是:

企业停工已数日,复工复产在行动。
正常限制有必要,过度防控要叫停。

文 @十八刀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莫让防疫卡点成为风险隐患

□□ 曲征

行管理,于是在人们经常通行的路口、地点都设置了防疫卡点,由基层干部、物业公司、民警、网格员、志愿者等人员在卡点进行防控工作。社区(村庄)原则上只保留一个进出通道,对不戴口罩的进出人员进行提醒劝返,且对进出人员一律测温。

客观而言,这些防疫卡点为防止疫情的蔓延,起了巨大作用,但一些地方因为在细节上考虑不周,尤其是“拦路绳”的设置上存在问题,导致安全事故极易发生。从路人安全角度出发,最好不要使用“拦路绳”。即使要用,在悬挂的时候,也应该距离地面高一些,且应该在绳子上悬挂醒目的标志物,同时值班

人员应该在绳子旁边值守而不能相距太远。

目前,疫情尚未完全结束,很多地方还没有接到解除封闭式管理的通知,在一些地方“拦路绳”依然存在,但是随着疫情形势向好,值班人员离开卡点的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如果唯留一张桌子、一根绳子置于卡点,危险还有可能继续发生。当前,农村处于春耕备耕的大忙季节,人们路过各种路口的频次较高,撞上类似“拦路绳”的概率也就增多。

实际上,对于封村封路的做法,相关部门早就有过专门的指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解决当前实际困难

加快养殖业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明确指出,对封村封路、一概劝返等不恰当做法,要坚决予以纠正。这个政策下发后,一些地方陆续取消了封村封路的做法。

当前形势下,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要两手抓、两不误。复工复产正在加速推进,道路交通影响重大,各地方一定要严格落实分区分级防疫措施,卡点暂时还不适宜撤销的地方,也应该保证道路畅通,工作重点应放在测量体温、记录进出人员信息等方面;卡点该撤销的地方,一定要第一时间撤销卡点,不拖延、不滞后,在撤销卡点的同时,要注意检查风险细节,做到阻挡清零、不留隐患。

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不容忽视

□□ 钱立功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现象,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保障措施等,都作了明确要求。但从各地落实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家庭监护缺乏监督指导、关爱服务体系不完善、救助保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防范、遏制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

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统筹协调,建立健全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加强对监护人的法治宣传、监护监督和指导,督促家庭履行监护责任,提高监护能力。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实行动态管理、精准施策。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心理、人格积极健康发展,及早发现并纠正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提

供便利条件,从源头上减少农村留守儿童。要始终对侵犯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从严惩处,对犯罪分子产生威慑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关系到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到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各部门应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力度,确保留守儿童人身有安全、教育有保障、生活无忧愁、心理有疏导,身心都得到健康发展。



有媒体报道,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做企业要像农民耕地一样,不要追求强大,而要追求活得好,活得久。如果媒体没有断章取义的话,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农民耕地,如果不做大做强,肯定是活不好的,即便活得久,也是活在温饱线以下。

小,收入就低。以农业人口最多的河南省为例。全省1845万农业经营户,12167万亩耕地,平均每个农户占有耕地6.6亩。对于大部分农户来说,通常每年种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每亩净收入在500-1000元之间。2019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3962元,也就是说,河南省一个普通农户全年种地的收入,仅相当于农民工一两个月的工资。如果农民就靠耕地过活,能活得好么?

小,科技成果就不好用。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在河北省搞研究,发现深耕可以显著提高小麦亩产。但是,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地块,是无法采用大型拖拉机深耕作业的。后来,还是通过合作社等方式,把作业地块扩大了,才采用了新技术。

小,就难以以优质发展。市场需要专用优质专用小麦,但一家一户的农民,光自己种植优质专用小麦,并不能卖出高价。因为没有哪个企业,可以对单个农民做小数量的优质小麦,进行单收单运单储备加工。

小,就做不出品牌。种植大田作物的不用说了,即便是种植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水果、茶叶等,也没有哪个小农,能够做出品牌。

搞农业,尽管做大不一定等于做强,但是,不做大,肯定做不强。

有不少学者以及社会人士,对小农有着深厚的情怀,值得致以敬意。不过,在对待小农问题上,其实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层面,需要区分开了,分别对待:对于仍然深陷于小农状态的农民,我们应该寄予深切关爱,并施以帮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小农状态本身,或者小农的生产方式,也寄予厚爱,竭力维护。恰恰相反,如果是真正关爱小农状态下的农民,那就要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想办法,让他们脱离小农状态。

应该看到,广大小农现在的小,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各种因素制约下的迫不得已。

最终的出路,只有两条:愿意进城的,让他们进城;不愿意进城而愿意继续务农的,让他们把规模做大,把产业做强。

把农业做大,做出规模,也有两条路:从长远看,是不断扩大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向着家庭农场的方向发展。欧美国家的家庭农场,可以借鉴。我国东北等少数地区,已经初见端倪,有了一些规模达到几百亩乃至更大的农场。此外,还有少量合作社性质的农场,经营规模还要大一些。

在短期内,大部分地方仍然无法达到那样的规模。这时,可以采取另外一种规模化路径,即区域的专业化。通过区域的专业化,来克服单一农户规模小的不足,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的难以机械化的园艺生产方面。

近年来,在市场机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引导下,我国区域专业化发展态势明显,已经出现了不少典型。其中最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县一品”。

例如,陕西洛川县有50多万亩苹果,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0%;眉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超过全县耕地面积的80%。在这两个县,尽管每一个农户的果树面积也不算大,但由于实现了区域规模化,单个的农民,就能够享受到很多规模效益。例如,在技术服务、市场服务、品牌效应等方面。洛川苹果、眉县猕猴桃,不仅享誉全国,也开始走向境外了。

当形成区域规模化之后,自然会把农业院校的研究人员吸引过去。在洛川县和眉县,都有农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的实验室,专门研究苹果和猕猴桃。农业科研人员不可能错过这样的集中产区,原因很简单,任何一项科技创新,在这里,都会得到高度重视,都会得到放大性的科技推广成效。

还有一个案例,也能说明些问题。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县的农产品推介大会。该县领导苦恼地说,全县共有7个地理标志产品,都是水果类的,但却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我追问后获知,全县种植水果的园林总面积,还不到20万亩。

在活动过程中,主办方让大家品尝了这些水果,然后,主持人对我进行了即席采访。我想了想,说:作为普通消费者,我觉得这些水果吃起来都不错;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学者,我想说,这些水果,可能有一两种,质量在全国属于上佳,甚至最佳之一,而其他的,质量在全国只是普通的,中等的,有的可能还不到中等水平。只有质量最好的产品,才能在全国的市场上有影响;而你们质量最好的产品,规模又太小,就难以有全国的影响。对于一个县来说,决定产品质量的,最终是两个因素:一是自然条件,二是科技水平。这个县的自然条件,不可能对7种产品来说,都是全国最适宜区;而7种产品,要想都获得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也是不可能的——规模大小了,高端科研人员的兴趣不会大。我举了洛川苹果和眉县猕猴桃的正面案例。

几个月后,我获悉,我的以上观点,引起了当地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该县主要领导也高度认可。他们进行了认真研究,判断出7个地标产品中的一个,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决定把那种产品作为重点,强化支持,做大做强。闻此,我很是高兴,也很敬佩当地领导的开放思维和决断能力。

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三个维度

□□ 何虹 樊小斌

绿色是“三农”的底色,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目标,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近年来,各地金融机构开展了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农村绿色金融政策不完善,资金渠道单一,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绿色金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发展绿色金融,事关生态农业产业兴旺,事关城乡融合发展。加大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还需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加大力度。

宏观层面要从优化政策环境入手。优化农村绿色金融法律政策环境,明确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体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明确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的实施工规细则与各部门的监管职责。同时,要细化政府支持机制,包括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绿色投资领域、财政补贴与考评奖励结合激励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乡村振兴、建设信息共享平台等,以提高绿色资金的配置效率。

中观层面要从拓宽“三农”主体绿色融资渠道入手。充分利用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优势,通过参股的形式,与涉农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往来,从产品、技术、资金等方面针对“三农”绿色金融提供服务与支持。涉农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农户+企业”绿色贷款模式,增强贷款的信用等级,降低贷款风险;同时,围绕乡村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形成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多种绿色金融产品协同的绿色金融产品线,为“三农”主体提供一揽子的金融服务,满足乡村振兴多层次的绿色资金需求。

微观层面要从金融机构入手。农村金融机构必须加强对农村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要回归本源,主动成为农村绿色金融供给主体;要制定长远的绿色金融计划,要将节能减排、生态治理落实到农村绿色金融业务中。探索以合适的条件,允许外资设立乡村振兴独资或合资金融机构,在部分地区乡村进行绿色金融业务的试点。业务试点成熟之后,因地制宜向全省乃至全国进行推广。